

家书里的赤子初心

郭平

提示 《百年革命家书》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会同有关方面收集整理100封革命英烈家书。每封家书附有手稿影印件、革命英烈简介和家书注释。家书中既有热血男儿就义前的绝笔遗言,也有战斗间隙对家人的挂牵思念;既有对父母兄妹的殷殷嘱托,也有革命伴侣的依依深情。品读红色家书,感悟初心使命。



对土地和人民爱得深沉

《百年革命家书》收录的100封家书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牺牲的英烈。编者细心地考证了家书完成的时间,比照英烈

生平,人们不难发现,写出这些家书的英烈绝大多数年龄在20岁至40岁间,处在风华正茂时期,在英烈们留给亲朋的书信当中,字里行间透出昂扬的激情,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热爱。

1925年,因叛徒出卖,25岁的史砚芬不幸被捕,他在狱中给弟弟妹妹写下遗书,用工整的楷书写道:“我今与你们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必要的。”他确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必有光明前途,“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们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

1935年,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的刘伯坚率部突围时受伤被捕,他在给兄嫂的遗书中写道:“我为中国没有一文的私产,”因为“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了国家和个人”,而他却用生命践行了遗嘱中“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铮铮誓言。

1940年,28岁的潘涛率队在湖北嘉鱼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他给妻子匆匆写下的短信中告诉爱妻:“倭寇践踏我国河山,苏区许多同志为国捐躯,其中不少是汝熟悉之同志,吾与战友化悲痛为力量,急赴前线杀敌。倭寇不除,国无宁日,谈何家全?”信中还写道:“抗战胜利之日,就是我返家之时。”表达了先国后家、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

时。”表达了先国后家、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

1947年,时年30岁的冯和兰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她在狱中坚持斗争,在遗书中,冯和兰提到一双儿女:“待他们长大成人,请告诉他们:我是为人民而死,顾不得儿女,请他们原谅我!”巾帼英雄,浩气长存!

对亲情无限眷恋令人动容

书信之所以被称为温柔的艺术,就在于其不仅是一种信息上的沟通,还在于书信写作所呈现出的亲切、细腻的情感,极强的个性化表达以及抒情方式的多姿多彩。家书更是维系家人情感的一种联系方式,就像与家人谈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

献身革命事业的英烈是直面鲜血的勇士,同时也是为人夫、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父母,《百年革命家书》中革命先辈对家人深深的挂念和对亲情无限的眷恋令人动容。

李传燮烈士在1926年写给弟弟的家书保存了下来,家书中他细心叮嘱弟弟“住在学校宿舍里过小规模团体的生活,公德最为重要,良好的习惯不可养成。如天天上日记,清洁,天天洗足。每天的光阴,分配于读书、游戏要平均,不可偏重。早睡早起等”,笔触细腻,感情真挚。

身患重病的叶天底被捕后,他预料到敌人很快会对他下毒手,留下了给哥哥的遗书。对待敌人“我绝不跪着生,情愿立着死”的叶天底,想到了母亲,深情

写道:“但我最放心不下母亲,希望你代我尽孝。”

1928年,因叛徒出卖,年仅21岁的陈觉被捕,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陈觉写给妻子赵云霄一封遗书,遗书中,陈觉回忆与妻子从相遇、相识到相知、相爱的过程,两人怀有同样的理想信念,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遗书中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缔良缘”,正是他们深厚感情的生动写照。

抗日英雄赵一曼被捕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酷刑,宁死不屈,在被日寇押往珠河的列车上,她给儿子留下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对于自己心爱的儿子,她寄予了殷殷的期望:“希望你,宁儿呵,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呵!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辽宁大地留有他们的足迹

《百年革命家书》中家书的100位作者既有普通党员,也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辽宁读者而言,其中多位英烈就曾在辽宁这片热土上工作、战斗过。

1923年,25岁的张炽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男是志者,是一有大志者,是一欲为社会

造福者。”3年后,张炽受党的委派来到大连组建党组织,并任大连地委宣传部长。他在大连工作期间领导了闻名全国的福纺纱厂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统治者。

1926年,正在日本留学的童长荣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所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5年之后,童长荣来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931年11月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领导东满抗日斗争。1934年3月,童长荣在与日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抗日英雄赵一曼为辽宁人民所熟悉,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受党委派,曾到沈阳的工厂中领导工人进行反帝斗争。

1945年,出生于法库县的刘卓人走在党中央选派的挺进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行列中。行军途中,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其中写道:“我们队伍因急于前进,将编两个队伍,一部分走得更快些,我毫无疑问将编入这个队伍。”当时刘卓人身患肺病,体力不支,但他不以为苦,以极大的毅力克服苦难。

《百年革命家书》收录的朱瑞给母亲兄长的家书写于1948年9月,当时因为战事紧急尚未发出。1948年10月,朱瑞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血洒辽宁这片土地。斯人已逝,其志永存。

爱书人要远离“三病”

贾登荣

谢肇淛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他学识渊博,诸子百家之书,无不涉猎,故能博古通今。除此,他还酷爱收藏书籍,“自六经子史,以至象屑稗史、方言、地志、农圃、医卜之书无不蓄。”谢肇淛还勤奋笔耕,著述不停,为后人留下大量笔记小品,其代表作《五杂俎》至今流传。

数十年浸淫于书籍之中,谢肇淛自然有对藏书、爱书、读书的独到见解。谢肇淛认为,作为真正的爱书人,一定要远离“三病”,才能有所成就。谢肇淛根据自己与大量爱书人的交往,在《五杂俎》一书中总结出爱书人身上的三种病:其一是,“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耀,驷马之外,一切不取,谓之无书可也。”也就是说,有的人

只是图虚名,仅仅把书籍作为一种装饰品,放在自己家中炫耀,用以粉饰自身内心的空虚与一无所知。这样的所谓爱书人,其实根本不爱书,尽管收藏了大量书籍,最终还是不学无术的“无书”之徒。第二种病是:“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沉灰土,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虽然也穷尽财力,广收博蓄林林总总的书籍,收藏的数量十分丰富,但却是收而不读,或者是泛泛而谈,不加探究,更不加领悟。很多时候,堆积如山的书籍成了承接尘土的器物。这样的爱书人,或将书籍束之高阁,或浮光掠影地读书,最多算是一处藏书的“书肆”而已,根本不配为爱书人。第三种病是:“博学多识,氓氓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

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第三种爱书人不但大量藏书,也热衷于读书,甚至用功到了“矻矻穷年”“背诵如流”的地步;但可惜的是,思维僵化,机械教条,食而不化,“寸觚莫展”,只是面对墙壁读死书,不能从书中走出来,不能跳出书本的束缚,形不成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只能跟在古人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能把书本知识转化为人生的智慧,从而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样的爱书人,也只能算是“肉食面墙”而已。这艘机械教条的读书,于己、于事、于时,也是没有多少裨益的,也是不值得效仿的。

谢肇淛在指出爱书人的三种病之后,最后提醒爱书人说,“夫知而能好,

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其意思是说,作为爱书人,首先要“知书”,也就是了解书,懂得书,这是“好书”的基础;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能运”书,即活化书籍,将书中的观点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并运用到实际中去。这,则是“好书”的根本目的。古人好多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何况今天的人呢?应该说,“知而能好,好而能运”是最不容易做到的,又是真正的读书人应该追求的目标。所以,“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应该成为读书慎终始的座右铭。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必须克服、远离“无书、书肆、肉食面墙”这三种病,逐步做到“知而能好,好而能运”,这样,才能从爱书、藏书、读书中享受乐趣快感,获得真知灼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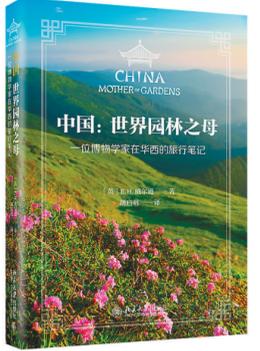
博物学家的科考旅行笔记

马泽洋

提示

1899年至1911年,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威尔逊4次来到中国,凭专业知识和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共录得植物标本6.5万号,含约5000种植物,世界园艺界称他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旅行笔记》这本书既是植物学家的学术科考报告,又可看作是一部丰富的旅行探索笔记。



科考中景色壮观路程艰辛

威尔逊在此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千真万确,在对我们的园林贡献很大的那些国家中,中国位于榜首。”然后,他用数据展现在中国进行

植物采集引种的成果,强调中国植物对世界园林的贡献。“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或欧洲找不到一处园林没有来自中国的植物,其中有最美丽的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

1899年威尔逊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直到1911年最后离开,他以一个对自然历史都饶有兴趣的博物学家的眼光来观察探索。他感叹,很难想像中国的植物是如此之丰富。他一边进行着科考,一边沉醉于壮阔的景色之中,“那里有千百万辛勤劳动的人们和绮丽的景色。”

威尔逊在中国考察的行程是从宜昌开始的,宜昌在中国植物考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闻名于世界园艺界,因为它是“湖北百合”的故乡,这一生长于石灰岩中的植物,深受大众的宠爱。“每当清晨或一阵小雨之后,漫步于山谷间,空气中浮动着的幽香,真如置身于人间仙境。”

1910年6月,威尔逊带领由20个搬运工组成的采集队,从宜昌到湖北西北部再到成都。一路地势崎岖,风景壮丽,旅程艰辛又有趣。作者描绘在湖北宜昌考察时的情景:石灰岩峭壁高达500英尺,却是受植物学家的特别关注。作者一行人进入了神农架群山中,最高海拔超过1.1万英尺,这里没有兽类生活,连一只飞鸟也看不到。中间却保留有原始森

林,由冷杉和桦树组成。树下有密集的杜鹃花。有粉红杜鹃、麻花杜鹃、四川杜鹃、弯尖杜鹃4种,山路的尽头还有小草吐绿,有高山报春花和蒲公英。

威尔逊提到探险之路的艰苦,比如一段2600英尺令人心碎的上坡。天气格外炎热下走过一段崎岖、陡峭、人烟稀少的地区,他不禁慨叹“我真不想再次见到它”。以景色而论,石灰岩地区壮观,但在其中行走,其可怕和艰难的程度非语言可以表达。尤其遇到山间暴雨时,连住的屋顶都像筛子一样,雨水把屋里的土地变成了泥沼。“我们挤在一起,尽一切努力避免被淋湿,同时想办法取暖,但夜长而凄凉。”

1910年7月,在四川的峡谷中穿行,在一处山崖顶上,上攀途中发现了野生中国的玫瑰——月季花。作者惊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月季花野生标本。”

路程艰辛,景色壮观,作者也得到了补偿,这一路采集到很多木本植物,都是从未采集过的,甚至不认识的。“在我到过的地方,这里是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后来我在此采到一大批优良种子,培育出来的苗木绝大部分已茁壮生长于欧洲和美国庭院。”作者说,“我们见到的森林、山峦风景,加上所发现的各种植物和采集到的植物标本,是我所经历艰辛得到的丰厚回报。”

中国植物轰动西方园艺界

1545年,葡萄牙人第一次把中国的甜橙引种到欧洲,燃起了

西方植物学家和园艺界对中国植物的强烈兴趣。16世纪到19世纪末,西方通过各种途径从我国引进植物。

1899年至1911年,植物学家威尔逊4次来中国,成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他采集到许多有价值的观赏植物,轰动了整个西方园艺界。在前后4次历时12年的采集中,威尔逊共录得植物标本6.5万号,含约5000种植物,寄回1500种植物的种子。最后有1000余种植物引种成功,在西方落地生根。

威尔逊认为,在美国或欧洲的园林中,如果没有中国植物就不成为庭园。据报道,美国加州的树木花草有70%以上来自中国。他说,如果没有中国植物的原始材料,我们今日之庭园和温室花卉会是何等的贫乏。

威尔逊惊叹“中国中部和西部遥远僻静的山区简直就是植物学家的天堂。”他认为中国西部的植物是全球最丰富的温带植物区系。威尔逊在书中揭示了,中国是“全球花卉王国”“世界园林之母”。

游历考察中个人化的抒写

威尔逊写到了游历考察中非常个人化的感受。他说:“我前后三次到达松潘城,每一次都流连忘返。如果命运注定我要生活在中国西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在松潘。虽然海拔相当高,但气候终年温和,非常好,通常天空碧蓝……更不用说多种多样的植物了。”

作者描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服饰、习俗以及他们动听的吟唱,

他说,“虽然我与他们交往的时间很短,但我一直受到礼遇,使我在这群幸福而天真自然之子中领略到很多欢乐和情趣。”

1910年8月25日,威尔逊离开松潘,沿岷江走了8天,在地图上十分详细地标注了6000颗“岷江百合”的生长点。9月5日,威尔逊在返回成都的途中,在汶川山下索桥的岷江河谷边遇到塌方,右腿被山上滚下的石块砸断,从此留下终身残疾。

尽管威尔逊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苦,但大自然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当“岷江百合”被他成功引种到西方后,立即在世界园艺界引起轰动。“岷江百合”的花非常大气,色彩鲜艳动人。现在国际市场上看到的百合花实际上都是从中国四川岷江峡谷的野生百合培养出来的。这些中国原生植物成为西方上千种园艺植物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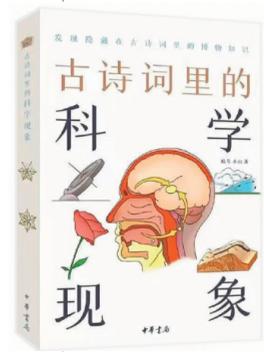
威尔逊带领他的采集队穿越湖北至四川边界时,在海拔8400英尺的地方度过寒夜,点起篝火,搭建竹棚。作者回忆当时情景,每个人都显得健康和精神。夜里,将棚顶一部分刮没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上的星星。“这是一个寂寞的地方,但能有机会来到这样一个远离世俗的地方,使人感到特别幸福和快乐。”

100多年过去了,百合花早已盛行全球花卉市场,它们的祖先就在岷江峡谷中静静地生长繁衍着。今天,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到此书此景,甚至能感到到当时夜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低鸣,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神奇的馈赠吧。

聊书

河汉清且浅 牛郎织女到底隔了多远

李海卉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牛郎星、织女星到底隔了多远?‘葡萄美酒夜光杯’,从葡萄到美酒,总共有几步?‘乡音无改鬓毛衰’,声音和头发,哪一个先变老?‘无边落木萧萧下’,原来叶落知秋,冥冥中自有激素调节。

这个解读古诗词的角度太独特了,简直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解构”。诗词与科学原本大相径庭,诗歌是感性的浅吟低唱,科学是理性的真知探究,在这里,科学试图揭开文学的面纱,一探美妙背后的真相。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古代诗人将执著爱情的追问抵达宇宙的层面。

一对隔河相望的痴情男女,面对遥远的银河星辰,发出慨叹:妻子思念丈夫,涕泪横流。在她看来,那银河里的水,并没有多远。然而,隔开他们的“河汉”究竟有多远呢?银河是一个庞大的星系,包括几亿颗恒星,直径要以几十万甚至几千万光年计,既不“清”也不“浅”。《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告诉你,说这两个星宿分别坐落银河“两岸”是一种视觉误差,它们的实际距离是16.4光年。

现代天文学把夜空中的星星分为88个星座,而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上分布的恒星分为28个星宿。在先秦时期,牵牛星、织女星两颗星本来一个“负责”指导祭祀,一个“负责”指导织造,并不是“夫妻关系”。而到了汉代之后,天文学家把它们统一归入二十八星宿之一的“牛宿”之中,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计算星象。而我们浪漫的先民对两颗星寄予了男耕女织的厚望,并用带有悲剧色彩的解读将两颗星锁定为永恒爱情的象征。

《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一书带你发现隐藏在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作者是两位科普作家暗号和小山,他们巧妙地将科普知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天文等角度解读经典诗词中的科学现象,赋予了诗歌别样的趣与美。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读到这样的诗句,为什么会让人感受到空寂渺渺时产生孤独的思绪?作者用科学的计算告诉你,宇宙有多古老,人类就有多孤独。

辣并快乐着 吃辣和共情关系的产生

李海卉



现在有一种戏谑的说法,不吃辣是新型社交的“绝症”。曹雨在《中国食辣史》中解读,共同吃辣的行为隐喻着“我愿意与你一同忍耐痛苦”,这种共情促进了信任的产生。那么,辣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痛觉?

曹雨用“良性自虐机制”解释人为什么热衷吃辣,辣椒使人产生痛觉,从而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但又不会使人处于实际的危险当中。在这里,辣并非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吃辣并不会导致持续的伤害,只是产生临时的灼烧感。

吃辣有一种炫耀意义,比赛吃辣实际上较量的是忍耐疼痛的能力,从而证明自己在身体对抗上占优势。一起吃辣变成了社交行为,与饮酒有类似之处,都试图通过自我伤害来博取同伴信任。

打开《中国食辣史》能了解到中国食用辣椒400年来的历史。学者曹雨从“中国食辣的起源”“中国文化中的辣椒”“辣椒与阶级”三个角度展开对中国饮食中辣椒的考察。

明朝末年,辣椒传到我国,起初先人对于辣椒的认识,首先是一种园艺花卉。园艺笔记《花镜》《广群芳谱》中都将其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收录——正如高濂对辣椒的简练评价“甚可观”。后来辣椒不再仅限于园林观赏,开始逐渐转变为药用,具有镇痛的功效。中国最早关于食用辣椒的记载,就是在清康熙年间。

中国人为什么会去吃辣椒?在最早记录的《思州府志》中已经清楚说明了——“用以代盐”。辣椒这种味道浓烈刺激的食材,被百姓投入代盐的尝试中。贵州人最初食用辣椒是迫于南方山区资源匮乏的生存压力,其目的在于“代盐”。而对于四川人来说,辣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滋味”。早在辣椒传入前,四川地区的人们便已经大规模运用姜和山菜蓟等材料获取辣感了。湘赣地区则是“辣得纯粹”,本身有着对辣的喜好和追求。

《菜根谭》中说“浓肥甘辛非真味,真味只是淡”,可是谁又能忍心放弃辣椒带来的快感呢?